

范文澜、胡绳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将“革命叙事”定型化、经典化,必须承认在1949年之后,“革命叙事”取得了压倒一切叙事模式的绝对优势。这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后果:一个多元的历史理解渐行渐远。

其实,从大历史叙事说,革命与改良相对待而存在,都是人类历史上不绝如缕的事件。但社会进步主要凭借改良,也就是中国老话说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人们提供适度保守,适度变革,推动社会进步。但有些时候,革命又不得不发生,没有革命的推动,旧势力不愿自动退出,旧体制无法改良。革命,是一种非常手段,又是社会进步过程中不得已的手段。因而,革命与改良在历史上往往交替发生。一个理想状态,大约像冯友兰的期待,大致维持革命与改良适度紧张与平衡,而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我有时强调这一面,有时强调另一面。右翼人士赞扬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而谴责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左翼人士欣赏我促进新命的努力,而谴责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我理解他们的道理,既接受赞扬,也接受谴责。”<sup>①</sup>

“革命叙事”是一个伟大创造,居功甚伟。但一定要谨记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与其他一切叙事模式一样,都是为了“说话方便”,并不代表历史本身,更不是一切历史。一个多元开放的历史叙事,依然需要学界同仁不懈努力。

<sup>①</sup> 《在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的仪式上的答词》,《冯友兰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 蒋廷黻与中国近代史书写

尹媛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当陈旭麓向钟叔河推荐重版蒋廷黻写于1938年的《中国近代史》时,萦绕在他心头的是蒋廷黻在书中所宣告的那个论断——中国近代以来的根本问题,就是能不能实现近代化;若能,中国是有希望的,若不能,则中国的未来是没有希望的。“近代化”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成为知识界一个流行的“热词”,到改革开放以后成为若干思想解放运动所呼应的时代主题词,中国学人对它的内涵以及与中国现实关系的理解,经历了若干起伏与变迁。作为建国后一段时期内被当做胡适派资产阶级学者在近代史领域内的一大批判对象,蒋廷黻及其所倡导的现代化史观,在改革开放成为国策之前就被有识者重新重视,这不是历史的巧合——在思考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问题时,这更像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原点。

蒋廷黻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起于外交史,当时他的目标是要对马士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作出中国的回应。在《中国近代史》中,外交方面的内容占了很大的比重,这种格局是由蒋廷黻对于中国近代史的整体看法决定的。在他看来,中外关系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中最重要方面,通过中外关系这个视角可以展示出近代中国发展演变的进程,发现其中的教训。但这绝不意味着他研

[收稿日期] 2016-01-15

[作者简介] 尹媛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究外交史所依据的思想资源和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就仅仅是外交问题而已。事实上,他的外交史之所以能具有开创性地位,恰恰是因为他关注的焦点是中国与近代世界的精神关系,这也是他能够在错综复杂的近代外交中提炼出与近代化相关的重要内容的根本原因。

蒋廷黻关于近代的观念是在20世纪初年欧美学界所盛行的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及民族主义研究中浸润成长起来的。这既是一个十分“西方中心主义”的欧美学术界所关注的现实热点问题,同时也是来自落后国家的求学者所渴望知道的关于强者的知识。所以毫不奇怪的,直至晚年回忆这段求学经历时,蒋廷黻仍然念念不忘哥伦比亚大学沙菲尔德教授(William R. Shepherd)的“欧洲发展史”和海斯教授(Carlton J. H. Hayes)的“欧洲近代政治社会史”<sup>①</sup>。这两者无疑地为他了解欧洲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形成、民族主义的大行其道以及对外扩张的历史,为他形成与近代中国有密切关系的外来强者的认识,奠定了基础。与后来在中国大为流行的列宁的帝国主义观不同的是,哥伦比亚大学这些教授显然为解释欧洲国家的近代扩张寻找了一条基于民族主义思路的不同取向。

蒋廷黻完全接受了他们的分析思路。这一思路也为他关注和接受霍布斯(Jhon A. Hobson)关于帝国主义的解释做好了铺垫<sup>②</sup>。从1923年他基于对英国工党的对外政策研究的博士论文开始,一直到1938年他写成《中国近代史》为止,他都一直坚持这一思路,那就是帝国主义并非是资本主义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却是民族主义发展的结果——蒋廷黻将之命名为“扩张性的民族主义”<sup>③</sup>。因而,可以调节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的是国际主义的思想,或者民族协调合作的思想。而落后民族抵抗帝国主义的方法,是“升高自己的水位”,使彼不我侵<sup>④</sup>。值得注意的是,在蒋廷黻的观念中,民族国家是民主国家的基础,是必不可少的前一阶段。只有先发扬民族主义,民主国家才可期待<sup>⑤</sup>。而在欧洲发展史的逻辑中,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是近代化的基础。这是蒋廷黻近代化思想的源头之一。

这个源头通常被总结为“民族国家”的思想。但是,这毕竟是近代化的发源地、先进的欧洲的民族国家历程,对于落后国家建成欧洲式的近代化的民族国家,缺乏直接的参考价值。在蒋廷黻看来,与近代中国面临相似挑战的国家中,俄国、日本、土耳其的发展道路更值得注意。尽管我们一再地读到蒋廷黻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对彼得大帝的颂扬、对明治维新的肯定,然而,土耳其在他心中的重要性很可能要远胜过前两者。与俄日相比,抛开宗教因素不谈,土耳其前身奥斯曼帝国与帝制中国更为类似;从国际处境来说,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土耳其同样面临被瓜分肢解的存亡之患;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其领导者凯末尔以强力改革国家的举措,尤令蒋廷黻倾心不已。如果说,前两项因素导致蒋廷黻在汤因比目光指引下<sup>⑥</sup>,将视线投向这个近东的老大帝,那么,随着二三十年代土耳其现代化改革的进展,后一项因素则使蒋廷黻坚信: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实施自上而下的迅疾近代化的方案,是可以取得成功的。

① 蒋廷黻口述,谢钟璉译《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80页。

② 参看蔡乐苏、岳秀坤《蒋廷黻学术思想之理论基础初探》,《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③ 参看蒋廷黻博士论文 *Labor and Empire: A Study of the Reaction of British Labor, Mainly as Represented in Parliament to British Imperialism Since 188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p. 11-27。

④ “升高自己的水位”这一说法是受梁启超的启发。梁启超曾言帝国主义有如瓶水“水仅半器,他水即从而入之。若内力能自充塞本器,而无一隙之可乘,他水未有能入也。”“故今日欲抵抗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救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中国之新民《新民说》(一),见《新民丛报》1902年第1号,第7页)这种解释与蒋廷黻原有的认识颇为相合。而梁启超关于水位的比喻又给蒋廷黻以近代化来抵抗帝国主义的想法提供了一个绝妙的载体。

⑤ 蒋廷黻说“欲求 Democracy 之实现,国民须先有团结力与共同心,然后始能易君主为民主”(《蒋廷黻博士演讲“五·四与双十节”》,《南开周刊》第64期,1923年5月11日)转引自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43页。

⑥ 1926年,汤因比与柯克伍德合著了《近代世界各国》丛书中的《土耳其》,蒋廷黻对此书大为赞赏。1927年,蒋廷黻又阅读了该年6月汤因比在 *Harper's Magazine* 杂志所写的文章《中国革新运动与日本土耳其革新运动的异同》(蒋廷黻《评汤因比著〈中国革新运动与日本土耳其革新运动的异同〉》,《国闻周报》第4卷第41期,1927年10月23日)。

凯末尔所代表的精英阶层对于引领落后国家迅速现代化的价值,又恰好与蒋廷黻的精英主义思想不谋而合。蒋氏的精英主义思想既有传统中国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担当的成分,又深受近代欧美知识分子处理思想与实践关系的方法的影响,特别是费边主义的影响。许多费边主义者除倡导渐进的改革以外,还主张以少数精英分子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提倡,促进社会的进步。蒋氏求学于美国时曾听过拉斯基的课<sup>①</sup>;海斯关于民族主义也是近代国家间经济冲突的重要原因的观点,似乎也受到了罗素的启发<sup>②</sup>;在《独立评论》的创办上,呼应了蒋廷黻,起到了关键作用的丁文江就是罗素“一打好人”呼吁的忠实践行者<sup>③</sup>,两者在承担少数人的责任方面也高度一致;更不用说在现代化建设的具体方案方面,蒋廷黻深受费边社重要成员、著名经济史家托尼(Richard Henry Tawney)的影响<sup>④</sup>,甚至为了实践托尼所提出的改革中国行政的建议,“出山”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

当然,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到,蒋廷黻关于帝国主义的看法,其实可以说更接近于与列宁同出一源而又分道扬镳的社会民主主义。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下,自由资本主义的信仰遭到冲击;作为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反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备受中国知识界关注。1934年,蒋廷黻前往苏联搜集档案,蒋介石委托他以私人代表的身份向苏联刺探中俄合作的可能性,使蒋廷黻获得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实情的观察机会。这段经历之后,蒋廷黻在其描述近代化为中国唯一出路的标志性文章中提出:“斯塔林与希特勒在政治经济的立场上虽一个站在北极,一个站在南极,两人对于自然科学及机械工业都是维护的。”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质是“超近代的近代化”。由此,在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截然相反的国度,以自然科学和机械工业为特征的近代化却超越思想对立而存在着,这是蒋廷黻在无数次提及但并未系统论述“近代化”之后,终于形成《中国近代化的问题》一文的思想背景。在该文中,蒋廷黻明确提出“中国必须科学化及机械化,并且科学化和机械化就是近代化”<sup>⑤</sup>——而这,就是《中国近代史》的核心。

在这样的西方思想资源影响下,蒋廷黻开展他“学术化”、“历史化”的近代史研究,就诞生了后来被封为近代化史观之圭臬的《中国近代史》。

该书篇幅极短小,仅仅五万余字就将从鸦片战争到作者所处的1938年的近百年历史叙述完毕。全书除总论外分四章,标题分别是:剿夷与抚夷;洪秀全与曾国藩;自强及其失败;瓜分及民族之复兴。在总论中,他将中国十九世纪以来所遇到的空前大难关的原因总结为三点,一是科学的落伍,二是机器工业的落伍,三是民族观念的落伍。同时重申过去的观点——“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在以日本、俄国、土耳其做例子时,对日本、俄国简略谈谈,而对土耳其经验浓墨重彩;他尤其推崇基马尔(即凯末尔——笔者注)。他说“土耳其人经过那次大国难后,一致团结起来,拥护民族领袖基马尔,于是始得复兴。基马尔一心一意为国服务,不知有他。他认识了时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国非彻

① 孙宏云《拉斯基与中国:关于拉斯基和他的中国学生的初步研究》,《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② 海斯的观点发表在1926年的《民族主义论文集》(Essays on Nationalism)中,而罗素在1920年的《布尔什维主义:理论与实践》(Bolshevism: Theory and Practice)一书中就已表达过类似观点。

③ 朱学勤《让人为难的罗素》,《读书》1996年第1期。

④ R·H·托尼(1880-1962),经济史家和社会主义哲学家,1921年至1958年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英国劳工党后台的主要人物。1932年,托尼接受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委托并充任国际联盟教育顾问,在中国作将近一年的考察后写成了《中国的土地和劳工》(Land and Labour in China)。蒋廷黻认为此书的“好处诚是一言难尽”,并将该书第6章译并分别以《中国的政治》与《中国的教育》为题发表于《独立评论》第36、38号上。(R. H. Tawney著,蒋廷黻译《中国的政治》按语,《独立评论》第36号,第5页)蒋后来还在回忆录中说:“《中国土地与劳工》(Land and Labour in China)对那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而言是一本了不起的著述。书中除了许多其他的宝贵意见外,他建议中国政府首先应该建立一个行政有效的中心区。我从他的书中撷取这种观念,尽量在《独立评论》及与中国政界人士谈话时予以阐扬。”(《蒋廷黻回忆录》,第173页)。

⑤ 蒋廷黻《中国近代化的问题》,《独立评论》第225号,1936年11月1日。

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现在土耳其立国的基础算打稳了。”<sup>①</sup>

之所以强调蒋廷黻对土耳其和凯末尔的推崇,是因为这关涉到他所认定的最能救中国的近代化方案的选择。在《中国近代史》中,蒋廷黻相当看重“少数看事较远较清”的精英分子,但是他所赞赏的支持近代化改革的近代人物中,曾国藩、郭嵩焘、奕訢、文祥、张之洞、李鸿章、康有为等人,在他看来,都没有能提出科学的、彻底的近代化方案。相应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都是因为不彻底的近代化而失败。只有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和三民主义是能够救国救民的近代化方案。为什么呢?因为孙中山从小开始接受了长期系统的西方的科学的教育,具有科学的思想方法;更重要的是,“军政—训政—宪政”的设计与蒋廷黻先实现民族国家的统一、再培育民族主义精神、通过精英政党的领导实现快速现代化、在保障民族生存的基础上再模仿西方的民主制度的思路,几乎可以说如出一辙。

相应的,鸦片战争及其结果被视为中国固守于闭关锁国的天朝之梦,不愿向已经近代化的世界敞开胸怀,守旧的“攘夷派”打击那些愿以“近代的”、“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外国人的“抚夷派”,导致中国“又在睡梦中过了二十年”,从而未能像日本一样,立即奋起直追,浪费了宝贵的开启近代化的时机和光阴;太平天国虽则举起了宗教革命和种族革命的旗帜,但却毫无社会革命的思想,其结果只能是“旧式民间运动”<sup>②</sup>的复演,唯一的好处是使维新人士在镇压他们的过程中接触到了西洋的新式武器,打开了他们开眼看世界的窗口;义和团则由于其反对西洋、反对科学、反对近代化的特点,注定是一次反动的、被顽固守旧的统治者所利用的无用的抵抗方案。人民,在蒋廷黻看来,一定是与旧时代、旧观念、旧文化相联系的,他们只能等待精英知识分子的启蒙,跟随精英们的改革步伐,近代化的希望不能寄托在他们身上。而李鸿章意识到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意识到世界潮流不可阻挡,意识到未来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就是与日本之间近代化速度的竞赛,被蒋廷黻视为十九世纪中国最值得肯定的政治家。蒋廷黻以深厚的外交史功力,将甲午战争的前因后果清晰展现,同时指出“在近代的世界,败仗是千万不能打的”<sup>③</sup>——站在精英主导的近代化为国家唯一急务的立场上,蒋廷黻对统一的、齐心协力的、和平的建设环境的固执,都是顺理成章的。而经过了辛亥革命、民国初年的纷乱后,凯末尔式的领袖人物及其精神追求,当然应该成为全民族的奋斗纲领。这样,蒋廷黻在总结了近代以来出现过的历次“抵抗帝国主义”方案后,将读者的目光聚焦到了孙中山的救国方案上。他的近代史书写,可以说就是为了呼吁中国人跟随这“我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不可一误再误了”<sup>④</sup>。

蒋廷黻对写作时所处的时代怎么看?其实,再版时所“节略”的部分,显然也是经过“近代化”这个滤镜过滤后的结果。蒋廷黻说:“第一,现任国民党总裁的蒋先生在最近十余年之内的事业一贯的以中山先生遗教为本。认定偏左的共产主义和偏右的军阀都是误国的。他所领导的军政始终不离开三民主义。……第二,近年蒋先生鞭策全国向近代化这条大陆上迈进。铁路的加修,全国公路网的完成,航空线的设立,无线电网的布置,义务教育的提倡,科学及工程教育的奖进,及国防现代化,都是近几年的大成绩。……第三,……蒋先生为民族计忍受国人的非议和敌人的无礼,绝不轻言战,亦绝不放松民族近代化之推进。”<sup>⑤</sup>

尽管一再强调“整个儿的近代化”、“近代化就是全盘西化”,但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那样,民主制度却似乎并未进入蒋廷黻认识近代中国的视野之中。按理说,民主制度也应该是“全盘西化”的内容之一。蒋廷黻不重视民主问题,除了他的西学资源方面的因素外,中国实际政治的表现也是影

①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3-4页。

②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38页。

③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70页。

④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81页。

⑤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初版,第127页。

响他的重要原因。这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1933年11月福建事变对蒋廷黻思想产生的冲击。之前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半专制半民主的国家,自然,它下一步是应该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可是从闽变之中,蒋廷黻发现,中国人离现代的民族实在太远了。“我们的国家仍旧是个朝代国家,不是个民族国家。一班人民的公忠是对个人或家庭或地方的,不是对国家的。”<sup>①</sup>由于建立民族国家的理想的破灭,蒋廷黻认为,一切工作都得从起点做起。这个起点就是英、法、俄走上革命前所经过的专制时期。当然,这个专制不同于满清时代的专制,而是采纳科学和技术的专制,但无论如何,没有对国家的忠诚,没有牢固的民族国家的基础,国家的富强是没有希望的,而一个贫弱的国家是没有实现民主的可能的。

蒋廷黻的近代化史观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从其西方思想资源来看,当时弥漫于欧美学界的那种基于对自身历史的总结而诞生的一元历史观,由于其普遍性的需要,对欧美以外的、尤其是落后国家的历史采取了“摄入”和“扬弃”的办法。用这种历史观观察本国,就会裁剪掉本国历史中难以解释的部分,造成一定程度的与本土实际的剥离;同时又有一种凌厉的他者视角,冷峻的解剖世界潮流影响下的近代中国。他这部《中国近代史》之所以在近代史书写的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完全是因为将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骨骼,将他对中国出路的思考寄托到历史之中。这种阐释化的近代史踩中了当时思想界的痛点,同时又成为迟来的现代化建设时代的先声。

<sup>①</sup> 蒋廷黻《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0号,1933年12月10日,第4-5页。

##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文化审视

左玉河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sup>①</sup>,是民国时期对中国近代政治变化历程进行梳理和分析的史学名著。该著宏观鸟瞰中国近代政治变迁之大势,着力抓住近代政局变化的关键点,准确把握近代政治发展之历史走向,展现了非凡的洞察力和深刻的历史见识。如阐述太平天国运动后清廷政治权力下移与汉族官吏地位上升及由此引起的新的满汉矛盾,如从政治势力的消长及分化组合来观察民初政局,揭示了革命派、君宪派与袁世凯派相互争斗与分化而形成民初政治演进的基本态势,等等。除此之外,该著与相较于民国时期的中国近代史书写模式之特别处,在于从思想文化史角度审视中国百年政治史。该著虽名为“政治史”,实则具有更多的文化关怀,将中国近代政治变化置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流的广阔视野中,从文化碰撞与文化交流的角度审视中国近代政治之演进,发掘政治变化背后的深层思想内涵。因此,该著在中国近代政治大势的书写与政治事件的分析背后,

[收稿日期] 2016-01-15。

[作者简介] 左玉河,河南大学黄河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sup>①</sup> 该著初名《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1930年10月由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记述从戊戌维新运动到联省自治与南北军阀混战的30年间中国政治变化。作者随后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近代政治史课程,开始从鸦片战争讲起,直到中日甲午战争。抗战爆发后,作者任教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时将武汉大学讲稿与《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合编,易名为《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刊印(初由国立师范学院史地学会1942年刊印,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详细记述了从鸦片战争到北伐战争前后中国近百年政治变化。